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AI急遽發展對人類生存、社會秩序及倫理價值構成的潛在風險持續升溫，多國領袖呼籲針對前沿AI模型制訂具約束力的國際安全措施，建議聯合國設立專責機構進行監督，這能否在當前中美激烈競爭下為AI全球治理提供出路？本刊將於12月號刊出專輯，邀請學者就相關問題作深入探討。

——編者

中國與冷戰醫療史

在冷戰醫學史領域，既有研究成果大多聚焦美歐與蘇東地區，亞非拉地區雖亦涉及，但通常被塑造為醫學交流「受動者」形象。在此背景下，蔣華杰〈醫學與政治——中國與冷戰早期的社會主義全球醫療網絡（1949-1967）〉（《二十一世紀》2026年8月號）一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核心展開研究，深入揭示了中國在社會主義全球醫療網絡構建中發揮的關鍵作用，對補齊冷戰醫學史研究中的「中國短板」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蔣文依託多邊史料，從中蘇、中、朝、越，中國與東歐三個維度梳理相關脈絡，鉤沉

具體生動的史事案例，立體呈現出1949至1967年間中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開展廣泛醫療合作的歷史圖景。文章不止於史實的挖掘與還原，更以政治權力分析為思路指引，將橫向比較視角貫穿研究始終，清晰揭示出中國與不同對象開展醫學交流、推進醫療合作時，在政治意圖與權力結構層面的差異：在與蘇聯的交流中，雙方互為師生，中國獲得更為主動和平等的地位；對朝鮮漢醫「科學化」的支持，助推了朝鮮國內的政治動員與政治合法性塑造；與越南的合作交流作為「援越抗美」運動的組成部分，帶有鮮明的革命國際主義屬性與跨國特徵；與東歐國家的醫療合作高度依賴國際多邊組織，契合東歐國家組建由社會主義國家主導的國際醫療衛生機構的訴求。經由這樣的分析，冷戰早期社會主義全球醫療網絡的複雜紋理得以清晰呈現。

文章的結語富有理論深度：戰後社會主義醫療網絡的擴張受到強烈政治因素的推動，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政治權力關係類似，也呈現出「中心—邊緣」的結構特徵；但該網絡並未形成一個始終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的支配性角色，也

不存在一個長期穩定的權力中心。這一結論顯然是可信的，不過要進一步坐實和鞏固，仍需從兩個方面強化對該網絡建構中「蘇聯因素」的分析：一是蘇聯與除中國之外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醫學交流合作中的互動；二是蘇聯對中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開展醫療合作的政策定位與角色態度。

曲升 曲阜

2026.8.13

美國對華科技政策的糾結

讀劉磊、袁明杰〈糾結的開放：列根政府對華技術出口的雙重政策〉（《二十一世紀》2026年8月號）一文，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利用豐富的檔案與文獻資料，深刻剖析美國在面對中國這樣一個在冷戰末期地緣分量重、又不算盟友的大國時，在政策上無法甩掉的戰略包袱。1980年代初，列根(Ronald W. Reagan)政府在出口管制名單上把中國歸到「友好的非盟國」(friendly but non-aligned country)；高精尖技術出口確實出現了鬆動的迹象。但這種「開放」並不是善意的，其政策背後有着複雜的政治計算。一方面，美國拉攏中國以「聯華制蘇」，既是地緣上的考量，也是打開中國市場的鑰匙，從而讓中國通過技術引進邁入西方世界的科技軌道。另一方面，美國十分擔心中國的軍力崛起與科技獨立自主，在放寬限制的同時，又實施分類審查，將尖端技術列為出口禁區。故而，

美國在對華科技政策上呈現出一種「既用又防」的糾結，在安全焦慮、國家利益和商業利潤之間的來回撕扯。

本文可以說推翻了一種敘事：美國出招與中國接招的「衝擊—回應」模式。文章指出中國的政策實際上較為靈活：中國一方面啟動中蘇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另一方面大幅拓寬技術引進渠道，跟西德、法國等西方國家加深經貿合作。這種多向與多點的戰略對沖，壓縮了美國施展政策的空間。美國的高科技企業則擔心失去中國市場，反過來推動列根政府加快審批與放寬限制。因此，本文給今天中美之間的科技競爭與合作帶來啟示。首先，美國及其盟友內部從來不是鐵板一塊，這為中國留出周旋的空間。其次，破局的關鍵點在於自身對核心技術的掌握，中國必須實現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強。最後，在堅持科技自立自強的同時還需加強國際合作，形成由中國主導的全球網絡。

本文也為之後有關中美科技合作的研究提供了完整的政策史脈絡，設立了總體框架。文中探討的政策與項目在檔案文獻允許的情況下都能作為微觀研究的案例。譬如，在核能領域，廣東核電站項目所反映的是中國內部對不同國家技術在政治上的考量。1980年代初，英國深入參與到廣東核電站項目中。英方更傾向採用美國壓水堆技術的核島方案（最終中方採用了法國的核島方案，儘管法國的壓水堆技術同樣源自美國），其出發點是英美之間在合作上的便利性。但是，由

於列根政府在核能領域的對華限制，這個美國核島與英國常規島相組合的計劃最終流產。這樣的微觀研究將進一步加深我們對冷戰期間中美關係與中國改革開放歷程的理解。

李雲逸 北京

2026.8.22

重探中美關係正常化

中美關係正常化是二十世紀歷史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關於中美和解的解釋經常強調中蘇分裂、越南戰爭和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但是，歷史的進程終究需要人作出決策並付諸行動，而人的行動總會展示其複雜與多變的一面。劉曉原的〈1969年：美國尼克遜政府對華政策觀念的更新〉（《二十一世紀》2026年8月號）體現了這一特點。作者利用美國新披露的檔案，梳理了尼克遜（Richard M. Nixon）政府內部關於對華政策的形成，從領導人及其決策過程的角度還原這段國際關係史。

本文的貢獻在於準確地還原了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在1969年美國外交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之複雜性。基辛格很長一段時間內被認為是推動中美和解的先行者，其回憶錄的誘導使得此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但是，通過使用美方檔案，作者證明了基辛格並非美國對華政策轉變的奠基人。與此相反，基辛格將歐洲和蘇聯作為美國外交的首要對象；對於尼克遜希望與中國進行接觸的想法，基辛格一開始表達了疑惑與不解。即使在中蘇珍寶島衝突爆發以及尼克遜發表針對中蘇威脅孰輕孰重的「革命論點」

之後，基辛格仍反對總統的判斷。這與他後來聲稱自己「強烈贊同」總統判斷的說法存在明顯距離。作者據此指出，基辛格在1969年的作用以勸阻居多，反而尼克遜在推動觀念轉向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作者對這一史實的釐清為中美關係研究帶來相當有價值的修正。

本文的另一項貢獻，在於還原了尼克遜政府調整對華方針的曲折過程。如作者所言，1960年代後期美國政界與學界雖有對華和解的聲音，但是要扭轉兩國敵對的觀念，形成推動關係正常化的政策共識，絕非一朝一夕之事。作者呈現了尼克遜政府對華觀念由「腦」向「心」轉變的過程。文章還揭示了來自學界和外國領導人的資訊輸入，以及突發國際危機的發生，如何推動白宮重新審視既有政策；政府內部的意見交鋒則影響這些外部刺激向政策判斷的轉化。對這一複雜決策過程的還原，豐富了我們對於美國對華政策形成機制的認識。

不過，本文對1969年尼克遜的東歐之行則一筆帶過。1967年尼克遜訪問羅馬尼亞時，曾與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sescu）進行過會談，期間同樣深入涉及對華議題。尼克遜此行與齊奧塞斯庫結下友誼，隨後羅美關係的高速發展與羅馬尼亞渠道在中美關係的啟動都與此有關。若能利用相關檔案材料比較兩次會談，可以進一步辨明1969年會談促成了哪些新認識，以及它是否加強了尼克遜已有的想法。這將使尼克遜對華認知的形成脈絡更加完整。

洪力也 上海

2026.9.1